

革命伴侣周恩来和邓颖超

□ 刘春秀

周恩来和邓颖超相识于1919年五四运动中。

在这场反帝反封建和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周恩来和邓颖超脱颖而出。周恩来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邓颖超作为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执委兼讲演队队长也非常活跃。9月16日，他们还一起加入了由周恩来等发起组织的青年进步小团体——觉悟社。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和张若名、郭隆真一起从上海乘“波尔多斯”号邮船，漂洋过海远涉西欧勤工俭学。

周恩来到达欧洲后，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6月，周恩来和赵世炎等组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陈独秀建议将旅欧少年共产党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3年2月，周恩来当选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

随着周恩来政治上日渐成熟和年龄的逐步增长，他对男女之间正常的恋爱和婚姻关系也由坚持独身主义转而较能正确对待，并且开始着意寻觅自己的终生伴侣了。

周恩来初到西欧的一段时间里，与张若名走得比较近，两人一起经过五四风浪考验并一同赴西欧勤工俭学。1902年2月，张若名生于河北省保定清苑县温仁村。她聪慧美丽、才思敏捷、文笔犀利，不仅在五四运动中是和周恩来、郭隆真等一起冲锋陷阵的天津爱国学生领袖，还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员、国民党旅欧支部第一届评议委员，也是最早在国内外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女性。后经她的努力，成为中国最早留学法国的文学博士。但是由于1924年初，在法共里昂支部举行的追悼列宁的大会上，中国共青团在法国的主要领导人任卓宣，置在会前法共已得到的法国政府不允许外国共产党人参加这一活动的情报于不顾，硬是要张若名按组织决定参加大会，并在会上发言。致使会后张若名受到法国秘密警察询问，险些被驱除出境，自此一直有法国警察对其跟踪盯梢。张若名在身份完全暴露，很难继续进行革命工



作的情况下，经过反复痛苦的思想斗争，不得不做出脱离政治、退出组织，留在法国专心读书的决定。

张若名脱离革命队伍后，使早已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并表示要“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的周恩来，对自己的择偶标准重新进行了审视和思考。周恩来经过慎重思考，他觉得既然自己决定献身革命事业，那就随时都有流血牺牲的危险。因此应该找一个志同道合、意志坚强、“能一辈子从事革命”，经受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的伴侣，于是周恩来将目光投向了五四运动中充满革命热情、勇敢坚强的邓颖超。

邓颖超于北平女师毕业后，先后在京师国立高等师范附小、京师公立女子第七高小任教。1922年8月，邓颖超受天津刚创办的私立达仁女校校长马千里之邀，到达仁女校任教。马千里是著名教育家、天津《新民报》总编辑。他思想开明，主张妇女解放。“达仁女校在马千里先生主持和领导下，是一个开明、民主的学校，教员无拘无束地参加社会上各方面的进步活动，甚至入团入党都没有受到校方的压力和干涉。他所聘请的教员，绝大部分是五四运动中女师的积极分子，大家都很团结，认真工作”。这样一个充满友谊和团结进步的氛围，给思想活跃的邓颖超创造了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的良好条件。

1924年1月，邓颖超参与组建天

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任特支宣传委员，1925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委员、妇女部长和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最令周恩来钦佩的是，随着时间的消逝，不少五四运动中思想进步的女学生，有的失去了往日的锋芒，革命意志消沉了；有的始终没有跳出旧礼教、旧习俗、旧观念和旧道德的怪圈，做了封建家庭的少奶奶；有的则沉湎于男欢女爱之中，迷失了前进的方向。唯有年龄最小的邓颖超，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和她的同事们一起将天津的妇女解放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

周恩来早在五四运动中就对邓颖超有好感。1922年冬，周恩来等派遣李维汉回国，向党中央正式申请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其旅欧支部时，曾委托李维汉到天津看望邓颖超，还给邓颖超带去一封信。从邓颖超的表现中，周恩来觉得邓颖超已经由一个积极参加救国图强的热血青年，成长为一个具有相当觉悟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工作者。经过慎重的考虑，他认为既然自己已经下定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终生奋斗，就应该找一个像邓颖超这样热情、坚强的终身伴侣。自此，从巴黎名城到渤海之滨的天津，周恩来与邓颖超通过鸿雁传书，增进了了解，增进了感情，确立了共同的革命的理想，要

想，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尤其是有一次，周恩来把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像的明信片寄给邓颖超，并在明信片上写了“希望我们两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那样，一同上断头台”这样英勇的革命誓言后，邓颖超也和周恩来一样下定了决心：“愿为革命而死，洒热血、抛头颅，在所不惜。”五四风浪中凝成的友谊和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献身精神，终于使他们由互勉互励的纯洁友谊，发展到相知相爱。

邓颖超在《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一文中曾非常形象地谈到她和周恩来确立恋爱关系时的情况：“我不曾想到，在我们分别后，在欧亚两个大陆上，在通信之间，我们增进了了解，增进了感情，特别是我们都建立了共同的革命理想，要为共产主义奋斗。3年过去，虽然你寄给我的信比过去来的勤了，信里的语意，我满没有在心，一直到你在来信中，把你对我的要求明确地提出来，从友谊发展到相爱，这时我在意了，考虑了。经过考虑，于是我们就定约了。”

邓颖超决定和周恩来确定恋爱关系前，曾经征求与她相依为命的慈母杨振德的意见。杨振德见过周恩来，并对他的人格、才学很赏识，认为：“恩来是个很重感情的人，是个感情很专一的人。”但是由于她非常疼爱自己的女儿，所以对女儿的婚姻大事格外慎重。她对爱女说：“恩来在国外，还是等他回国后再定吧！”慈母虽然这样说，但是邓颖超认为，人一生中找一个理想的伴侣并非易事。既然她与周恩来志趣相同，心心相印，就应该尽快答复他，不能再让他为此伤神了。

也在这时，周恩来又来信了，他希望邓颖超把他们之间的恋爱关系确定下来。这时，邓颖超没有再按慈母的意见等待，而是非常明确地答复了周恩来：我们思想相通，心心相印，愿相依相伴，共同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从这时起，周恩来、邓颖超成为生死不渝的革命伴侣，并携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整整半个多世纪。

（摘自2017年第6期《江淮文史》）

向警予：坚贞不屈 绝对忠诚

□ 张琳珏

在长江、汉水汇流处的龟山之巓，林木苍苍，清幽宁静。这里安葬着向警予的忠骨，庄严的墓碑上是邓小平面题的“向警予烈士之墓”。向警予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女创始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妇女解放运动领导人之一。在严酷的革命斗争中，她以巾帼不让须眉的豪迈气魄，用生命诠释了党的事业的绝对忠诚。

1927年7月，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武汉三镇陷入白色恐怖之中，革命形势更加险恶。11月，湖北省委主要负责人罗亦农调离，向警予担负起省委主要领导工作，成为敌人追捕的重要目

标。有同志不止一次劝说向警予转移，但她坚定地说：“大风大浪的时刻，一定要沉着、镇定！我绝不能离开！”向警予毫不畏惧，化装成女工、小学教员等开展活动，为湖北地下党的组织和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1928年3月20日，由于叛徒告密，化名易夏氏的向警予在汉口法租界被捕。她被关在武汉卫戍司令部军法处监狱里，卫戍司令前来“探监”，他“苦口婆心”地劝说向警予：“易夏氏，你是‘共党’第一个女党员，又是首任妇女部长，重任在肩，可惜你走错了路，现如今不是向警予，没有多大关系，横竖你们都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革命者不会在你们的屠刀下求生！等着吧，你们的末日，就在明天！”

着便递给向警予一张聘书。

面对敌人的伪善，向警予横眉冷对，说道：“共产党人只为人民幸福作盘算，我少年曾立过志，救国救民是我的心愿！”说罢，向警予将聘书撕得粉碎。敌人恼羞成怒，见利诱不成，便下令对其用刑。在严刑拷打和凶残逼供面前，向警予始终咬紧牙关，关于党的秘密没有吐露半个字。她大义凛然地说：“要杀就杀！至于我是不是向警予，没有多大关系，横竖你们都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革命者不会在你们的屠刀下求生！等着吧，你们的末日，就在明天！”

敌人气急败坏，对向警予下了毒手。1928年5月1日凌晨，刽子手们将向警予押赴刑场。在前往刑

场的路上，面对群众，向警予作了最后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讲：“我是向警予！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为解放工农劳动大众，革命奋斗，流血牺牲！我死而无憾！”听罢，敌人慌乱了，疯狂殴打向警予，死死掐住她的脖子令她无法开口。向警予费劲挣脱开来，昂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见状，穷凶极恶的敌人抓起地上的石头强塞进向警予的嘴里，又用皮带紧紧勒住她的嘴巴和面颊，鲜血从嘴角汩汩地流了下来，沿途群众忍不住流下悲愤的泪水。随后，年仅33岁的向警予被敌人枪杀，壮烈牺牲。

（摘自2016年第15期《中国纪检监察》）

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妇女刊物

□ 王慧青

1921年12月10日，党组织以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375号（今黄陂南路）创办了《妇女声》半月刊。这是我党创办的第一份妇女刊物，由李达、王剑虹（瞿秋白夫人）、王会悟（李达夫人）参加编辑工作。《妇女声》的栏目有言论、评论、世界消息、小说、诗歌、杂感、附录等。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妇女解放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分析了资产阶级妇女运动和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区别，指出妇女运动的中心应移到无产阶级方向，提出知识妇女只有与劳动妇女互相辅助、共同努力，才能最终实现男女平等等一系列无产阶级妇女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妇女声》第一期言论栏中刊登的王剑虹《女权运动的中心应移到第四阶级》一文，就明确阐述了共产党的主张。

《妇女声》在第一期附录栏“中华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中提出了本刊的十大纲领，首先要求得入一切学校与男子受同等教育；其次是帮助成年女子一切言论行为概不受父母、翁姑或夫的干涉；再次是在财产、工作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将受教育列入《纲领》第一款，是党为筹建平民女校作的启蒙教育和舆论宣传，希望通过办学校来发现和培养妇女运动的人才。在该刊第二期上，刊登了平民女校的招生广告，登载了平民女校的简章。

《妇女声》是党成立初期结合当时妇女运动的实际向妇女进行宣传教育的一个强大阵地，在提高妇女觉悟和促进妇女谋求自身解放的斗争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摘自2004年第2期《档案与史学》，原标题为《中共第一份妇女刊物与第一所女校的创办》）

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女校

□ 王慧青

1922年2月10日党组织以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3号A（今成都北路7弄42~44号）创办了第一所女校——平民女校。

校长李达曾概括过平民女校的特点：“一、为无力求学的女子设工作部，替伊们介绍工作，使取得工资维持自己的生活，实理工读互助主义。二、为年长失学的女工设专班教授，务便于最短时间灌输最多知识。三、为一班不愿受机械的教育的女子设专班教授，使能自由完成个性。”因此，平民女校是我们党为争取妇女解放、培养妇女干部的第一所学校。

平民女校的教师阵容是相当强大的，早期的共产党人李达、陈独秀、高语罕、陈望道、邵力

子、沈雁冰、沈泽民等都在学校任职。女教职员有高君曼和王会悟。

平民女校分别设有政治、语文、英文、数学、理化、经济学、教育学等课程，教育内容都是适应新思潮、启发革命觉悟的新教材。学校实行半工半读，设有缝纫班、织袜班和一个手工工场等，学生在课余时间缝制衣服和织袜劳动，以自己的劳动所得贴补学费和日常生活所需开支。

由于平民女校的教师大多承担着繁重的党务工作，加上经费紧张，1922年底，平民女校也停办了。但在平民女校就读过的许多学生，后来大多成了我们党妇女工作的领导骨干。

（摘自2004年第2期《档案与史学》，原标题为《中共第一份妇女刊物与第一所女校的创办》）



蔡畅（1900—1990）。从20世纪20年代起，她就是全国妇女运动的主要领导者，解放后又担任全国妇联主席近30年，其光辉的一生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旗帜和骄傲。

1934年10月中旬，红军开始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蔡畅在红一方面军地方工作部做群众工作，组织上给她配备了一头骡子，派肖贤忠给她当马夫。肖贤忠是江西吉安人，曾为李富春当过勤务员，知道蔡畅平易近人，深受群众拥护，因此很高兴地来向蔡畅报到。遵义会议后，组织上又将一位16岁的“红小鬼”曹昌分配给她当勤务员。从此，在漫长的长征路上，他们亲如家人，朝夕相处，同甘苦，共患难。

牲口要让伤病员骑

长征路上，除非遇到急行军蔡畅才骑上骡子，否则，她总是将骡子让给伤病员骑，或者让骡子替病弱的同志驮行李，她自己则和战士们一起徒步行军，有时一天要走百多里路，十分劳累。一开始，肖贤忠看不过去，憋不住唠叨几句：“大姐，求你骑上牲口歇歇脚吧，你要是累垮了，我怎么向政委交待？”政委是老肖对富春同志的习惯称呼。蔡畅说：“伤病员比我更需要它啊！他们要是掉队落到敌人手里，我们怎么对得起这些为革命受伤的兄弟呢？再说我和同志们走在一起，说说笑笑，更容易解除疲劳。”后来，肖贤忠看到许多首长平时也都是把牲口让给伤病员骑，对他们非常关心爱护，深受教育，对蔡畅也就多了些理解。以后他看到伤病员，不待蔡畅开口，就主动扶他们骑上牲口。

蔡畅久经锻炼，性格刚毅，能吃苦。许多同志都知道她爱唱歌，见到她就纷纷要求：“大姐，来支歌吧。”她从不推辞，立刻引吭高歌《国际歌》《马赛曲》，气氛顿时就活跃起来，热闹非凡。有时恰好遇到李富春和曾经一起留法勤工俭学的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肖劲光等同志，大家来了兴致，一齐用法语歌唱，个个神采飞扬，豪气冲天。这激昂的歌声，具有神奇的力量，使大家受到鼓舞，对前途充满了信心。肖贤忠常常被这种乐观的情绪所感染，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同大自然的殊死搏斗

漫漫长征路，敌军围追堵截，部队边战边走，经常是日夜兼程急行军。十多岁的曹昌究竟人小，体力不支，夜间行军容易犯困，蔡畅总是拉着他走。肖贤忠担心她的安全，总是劝道：“大姐，你放心走吧，小曹由我照顾。”小曹感到很难为情，心想领导派我来为首长服务，我怎能让自己来操心呢。他鼓起精神，不好意思地说：“首长放心，我能行！”他们三人就这样互相关怀，互相照顾，紧跟部队安全地穿越敌人的层层封锁线，后来终于胜利强渡大渡河，到达四川懋功以南的夹金山。

这是一座人迹罕见、终年积雪的大雪山，海拔4000多米，山势巍峨。山峰连绵不断，常年笼罩在一片白茫茫的寒雾中。上山前，部队稍事休息，指挥部专门作了动员，宣布注意事项，特别叮嘱大家千万不要在山顶停留，否则容易冻死。部队每人都分到一点牛肉干、几块糍粑、几个辣椒和两三块姜片，作为“御寒”食品。临行前，大家吃了一顿饱饭，喝了几口辣椒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每人拄着一根棍子，精神抖擞地出发了。山路是千年积雪铺成的，又陡又滑，每攀登一步，都要付出好大力气。

肖贤忠嘱咐小曹紧跟蔡畅，小心照顾她，他自己则牵着牲口吃力地往前走。蔡畅不放心，常常走到他后面去，帮着推推骡子。肖贤忠就说：“大姐，你别管我，你千万注意安全。”大家到达山顶后，仿佛力气都耗尽了，两条腿几乎挪不动了，多么想坐下来歇歇啊。但是高山上寒气逼人，空气稀薄，只要一坐下，就再也起不来了。宣传队的同志们在前面不断给大家鼓劲，蔡畅不顾疲劳，也和干部们加入宣传队伍，有的喊口号，有的打快板，有的高唱革命歌曲。队伍在阵阵热烈的鼓劲声中奋勇前进。

1935年8月21日，部队从毛儿盖出发，浩浩荡荡开进大草地。一眼望去，前面是一片茫无边际的草地，到处是腐草沉积的黑泥潭，谁要是一不小心踩进去，顷刻间就被吞没。指挥部下发通报，警告大家务必沿着先遣队留下的标记前进，又指出草坑里的水有毒，千万不能喝。蔡畅再三叮嘱肖贤忠、小曹要高度警惕，不能大意。一路上，他们避过一处又一处危险的泥潭，互相搀扶着，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往前挪。草地天气变化无常，不是倾盆大雨，就是狂风大作，有时还降冰雹，晴好的时候很少，大家常常被雨淋成落汤鸡。晚上宿营时，连一块干燥的地方都没有，大家只好坐在又凉又湿的草地上打盹，凑合过夜。蔡畅他们三人，就常常这样背靠背坐着睡觉。夜间天气奇冷，他们衣着单薄，就靠着彼此的体温“取暖”。虽然身上还是湿乎乎的，但是大家心里却感到暖融融的。

□ 蔡阿松

蔡畅在长征途中的故事

前面是一片茫无边际的草地，到处是腐草沉积的黑泥潭，谁要是一不小心踩进去，顷刻间就被吞没。指挥部下发通报，警告大家务必沿着先遣队留下的标记前进，又指出草坑里的水有毒，千万不能喝。蔡畅再三叮嘱肖贤忠、小曹要高度警惕，不能大意。一路上，他们避过一处又一处危险的泥潭，互相搀扶着，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往前挪。草地天气变化无常，不是倾盆大雨，就是狂风大作，有时还降冰雹，晴好的时候很少，大家常常被雨淋成落汤鸡。晚上宿营时，连一块干燥的地方都没有，大家只好坐在又凉又湿的草地上打盹，凑合过夜。蔡畅他们三人，就常常这样背靠背坐着睡觉。夜间天气奇冷，他们衣着单薄，就靠着彼此的体温“取暖”。虽然身上还是湿乎乎的，但是大家心里却感到暖融融的。

走进草地三四天后，粮食吃光了，水也喝完了，大家面临着缺粮缺水缺盐的绝境，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但是天大的困难，也难不倒这支不屈不挠、坚贞不拔的红军队伍。危难中他们靠挖野菜、剥树皮为生，有的人甚至连皮带都解下来嚼着吃。有的同志因误食有毒的野菜，不幸中毒牺牲。这真是一场同大自然的殊死斗争，惊天动地。蔡畅和干部们就组织肖贤忠和几位会识别野菜同志，带领大家分头去采集野菜，教大家辨认哪种能吃哪种有毒，使大家的安全得到保障。吃的问题暂时解决了，可是没有水，大家渴得嗓子眼都冒烟，有的嘴唇都干裂了，好难熬啊！后来有几次，肖贤忠和几位同志不辞辛苦，在远处的山坡下找到水潭，因为水浅，还要留给牲口喝，所以带回来的水，每次每人只能喝上三四口。大家都这样同心同德，团结互助，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磨难，在草地上走了七天七夜，再一次战胜了天险，安全地走出了草地。

生命要比粮食可贵

粮食是红军赖以生存的物资。但是行军途中征购得到的粮食，每次分到每人手里最多时也就是四五公斤，人人都把它视为宝贝，非常珍惜，连睡觉也抱紧它。蔡畅生性豪爽，为人慷慨大方，很多同志遇到困难，她就拿出来支援别人。

过草地时，有一次，危秀英、邓六金、廖似光、刘彩香几位女同志，因在后面收容掉队的战士，完成任务时，她们带去的粮食吃完了，只好忍饥挨饿，拖着疲惫的身体寻找队伍。找到蔡畅时，她们连话都说不出来。蔡畅看到她们那副狼狈的样子，知道她们饿坏了，也顾不上和她们说话，赶快煮了一大盆青稞端到了她们面前。她们也不客气，把一盆青稞吃了个精光。小曹在收拾碗筷时，看到她们一点也没给蔡畅留下，就噘着嘴，心里很不痛快。蔡畅看出小曹的心事，就亲切地和她谈起这几位女同志的战斗故事，她意味深长地说：“小鬼，你明白吗？生命比粮食珍贵啊！”

（摘自2006年第11期《湘潮》）